◎目錄

第一講

《聊齋志異》的接受與不真之真 10

第二講

狐狸到人間的路 30

第三講

狐狸的「人生」之真 54

第四講

科舉：為人的出口即絕處 80

第五講

書生的求取和非人之人的給予 110

第六講

從地府冥都回來的人 134

第七講

《聊齋志異》的鬼世與《佩德羅・巴拉莫》 152

第八講

志怪與異相：古典的荒誕與神實 188

第九講

被傳奇遮蔽的歷史、家庭與女性 210

第十講

在沒有神的宗教裏 232

第十一講

時間、空間與夢境 260

第十二講

《聊齋志異》中的桃花源與烏托邦 284

附錄　閻連科著作出版年表 302

第一講

《聊齋志異》的接受與不真之真

《聊齋志異》的接受
與不真之真

第一講
《聊齋志異》的接受與不真之真

1

經驗是一條時間的河道。文學的精彩之處都在脹炸出經驗河道那部分。所有脹炸而出的凸鼓、飛濺和塌陷，都是經驗的荒誕和謬誤。文學是為謬誤而生的。人類生活沒有了謬誤，也就沒有了文學。不同的文學，是謬誤不同的容器。作家是為各種謬誤而鍛造容器的人。

2

文學史是為人類的謬誤編繞而成的語言之河。今天我們的大陸上有多少河道和溪流，人類的文學史就該有多麼豐富和彎繞。在依水而居的人類生存過程中，我們消失了多少村莊與河道，我們就遺失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與偉大的文學。而今天——中國文學史中所謂的「四大名著」，一如《聖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樣神聖和正典。《聖經》成為那些信徒之正典，是人跡漫漫走過了幾千年的事，而「四大名著」成為我們的文學之正典，卻是最近幾十年的事。

時間委實太短了，一根筷子的長度都不夠。

話說明時候，江蘇太倉人氏王世貞（1526—1590），這位文學家和史學家，提出了「宇宙四大奇書」說——那時候，王先生當然還不太明瞭世界上的《聖經》、《荷馬史詩》、《變形記》（奧維德著）和《神曲》這類書。他說的「宇宙四大奇書」是：《史記》、《莊子》、《水滸傳》和《西廂記》。到了馮夢龍（1574—1646），這位王先生的同鄉、蘇州傑出的古典文學家，不光給我們留下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古典短篇之傑作，還把「四大奇書」修正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由此這種奇書說，從包羅宇宙的歷史、哲學和文學，正清、純粹到了文學上，尤其小說中間了。歷史像一頁紙般掀過去，之後金聖歎（1608—1661，又是蘇州人）提出「六才子書」的說法來。這六才子書是《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和《西廂》。而到了李漁（1611—1680）時，他認為《史記》是散文，《莊子》是哲作，《西廂》是戲曲，這些都不可歸為同類中，一如我們不能把天裝入筐子叫東西，將地也裝入筐子叫東西。他贊成馮夢龍的歸類法，由此馮的「四大奇書」說，便沿着歷史的河道汩汩流傳了。

18 世紀末，清乾隆年間，《紅樓夢》呱呱墜地。二百多年來，歲月每每撕去日曆都是伴着謬誤和修正謬誤的再謬誤。如此我們站在一個文學圖書館的頂端去回望，我們不得不感歎，中國小說的黃金歲月，哪兒是 20 世紀的 80 年代哦，而是二三百年前的明末和清初。那是一個黃金文學的滔滔大時代，80 年代只是中國的又一個黃金文學的鑄爐期，是一個文學的黃金小時代。這中間，相隔的時間委實太長了，一轉眼就是三百年。三百年只爭朝夕，又談何容易矣！更何況這三百年間還有偉大的現代文學在其中。一個無爭的事實是，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黃金期。而 80 年代及之後二十年左右的發展和延續，才是中國文學的又一個發軔滾滾的文學大時代。至於這個時代的文學是黃金、白銀或銅鐵，還得讓時間和歷史說了算。

回望小說的過往與今世，三百年前那個黃金大時代，是多麼洪流滾滾、驚濤駭浪哦。一不慎吳承恩的《西遊記》橫空出世了，宛若石頭炸裂，孫大聖飛躍天空；幾乎在這同一時期裏，《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鏗鏘誕生，帶着歷史的血腥與肅殺，夾裹着橫七豎八、枝枝蔓蔓的時代與社會的英雄大故事，讓小橋流水汗顏得如同山洪中的柴草和野花。倘若《聊齋志異》不是以近五百個短篇故事的聲勢集束團結在一起，任你狐仙妖異有多麼大的魔和美，也經不

起這些大流巨浪的沖洗。搖頭晃腦想一想，明去清來那個時代，小說的橫空與輝煌，確如電閃雷鳴般。而今天所謂的黃金歲月和大時代與新時期，也實為漁舟和艦艇之比了。當時間哀哀轟隆來到民國時，人們深感用「四大奇書」去囊括明末清初那個時代之文學，着實是要把天地都裝進一個農夫的背簍裏。於是，便又有了「六大奇書」說，在這「四大」中又加了《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兩部書。到了「五四」那個歷史拐點上，果真是撕去歷史的一頁紙，可能就有新歷史的新篇章。胡適一干先生們，竭盡全力推廣白話文，研究白話文學史，為中國白話的到來打開了閉關千年的古城門。期間胡適多次談到要「用活的語言作文學」。在《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中明確提出道：「故鄙意以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1] 這就讓「四大名著」這一定論和概念，再次有了種子和土壤。到了 20 世紀 50、60 年代，不光中國的經濟、政治是國有計劃的，出版也同樣是國有計劃的。在新中國的文化制度下，顯然如《儒林外史》、《聊齋志異》和《金瓶梅》，這些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古典文學傑作，是要被重新定位淘洗的。1951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嘭的一響

1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收錄於《胡適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6—37 頁。

應運而生了，根據一些過往的資料說，那時由馮雪峰[2]先生任社長兼總編，在他提出的出版計劃中，是包含中國古典文學的。這個中國古典文學，指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為了政治正確，理所當然地不含《金瓶梅》和《聊齋志異》等。數年後，出版全部歸紅色經典所佔有，一切的龐雜都是「大毒草」。但到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破冰訪華時，為了顯示中國出版的繁華和自由，還又重印了這四部書。如此又一頁的歷史掀將過去了。時間來到「新時期」，那時重新出現在高校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中，並無「四大名著」這一說，如卓有影響的鄭國銓等人 1981 年編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關於古典文學遺產的論述，清晰地闡釋了中國古典詩人、劇作家以外的古典小說大家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施耐庵（《水滸傳》）、吳承恩（《西遊記》）、吳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蒲松齡（《聊齋志異》），「他們的作品程度不同地集中了時代的智慧，成了人們認識生活、了解歷史的一面鏡子，具有生動而深刻的思想內容和豐富多彩的藝術表現力，因此往往代表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學的成熟程度及

2 馮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筆名雪峰，浙江義烏人。詩人，文學理論家，左翼文學主要領導者。

其藝術傳統，更是十分珍貴的文學遺產」[3]。然而到了 20 世紀偉大的 80 年代，在充滿轟鳴和朝氣的時代聲響中，一切都在撥亂反正中黑歸黑，白歸白，土地歸勞作，精神歸魂靈。到 90 年初，中國當代文學對西域小說、詩歌之熱求，藉助中國改革開放的門扉之洞開，暴風驟雨般地湧進來。閱讀與思考，成為那個時代的靈魂託兒所。所有的青年都在這個託兒所中補課、唱歌和跳舞，從而出版、印刷不僅是文化的復興集散地，也是經濟復蘇的原發地。今天被我們共同接受、認同到不可更改、替補的「四大名著」說，成為那時候出版社和出版商「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最為響亮、有力的廣告詞。「四大名著」說，也在那時的媒體、讀者、出版業和文學界，毫無質疑地形成了匆忙的認同和接受，一如每年中國的「一號檔」成為全年的政策綱領樣，被各個部門、機構和人們照單全收了。

就這麼，轟鳴隆隆的市場戰勝了究真之研究，「四大名著」這一概說最終牢不可破、堅如磐石了。《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成為國人的文學「聖經」了。而《金瓶梅》和《聊齋》，既是陰差陽錯的，也是時代意識的選擇和淘洗，從那個行列中讓人把它的鞋子扒掉了，不得不從「名著」的隊伍中落下來。

3 鄭國銓等：《文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 年，第 508 頁。